

# 居延考古的回顾

初世宾

本世纪初叶 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及现代科技的传入 在我国文化学术领域，相继有几批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出土，轰动全世界，即北京猿人、殷墟甲骨、居延汉简和敦煌藏经。被誉为是二十世纪古代东方的四大发现。这几批“国之瑰宝”的问世意义重大，对它们的学术研究，始终是国际上举世瞩目的“显学”。对本世纪中国的史学和文化学术发展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促进。

我在甘肃省博物馆工作的四十年中，有一段时期很幸运地参与了居延汉简的研究和再次考古发掘活动。沉湎其中，时日不短，然而所成甚微。现应约回忆、思考一些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值世纪之交 供后来者参考 亦聊以自慰。

“居延”作地名始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<sup>①</sup> 具体指甘肃、内蒙交界之额济纳河下游的嘎顺诺尔、索果诺尔一带。其地汉时为“居延泽”水草丰腴宜农牧 建置有“居延都尉”、“居延县”属张掖郡。汉以前称“弱水流沙”。但唐代颜师古注释《汉书》说“居延”是匈奴人的一支，因被汉武帝俘获安置于此，遂得名。汉代居延都尉的管辖范围，占据额济纳河流域的大半。这里东遮巴丹吉林沙漠，西依北山山脉为屏障，中为河谷绿洲，南北绵亘四百里。由于历史、气候变迁，现在是沙碛遍野、人烟稀少、环境恶劣，但在古代却是中国西部的南北交通枢纽和门户。尤其居延海附近，远控大漠，近卫河西 左右襟带河套、天山 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。

据史书记载 自西汉武帝开始 为抵御抗击匈奴不断南侵 一代名将如霍去病、李陵等曾亲率大军战斗于此，或驻守待敌，或挥师出击<sup>②</sup>。后又大规模修筑边塞城 燧 移民屯田戍守 长期相持近两个世纪之久，方克竟全功。汉代在居延的屯戍，对于中国西部疆土和丝绸之路的开拓、保卫有重要作用，也是世界军事防御史上罕见的创举、范例。而汉代以后 这里活动减弱 人迹罕至 绝少变动破坏 岁月留下大量遗迹遗物 如城堡、烽火台、屋舍、田渠的废墟，如今犹原样地暴露在荒原大漠之中，星罗棋布，触目皆是。这对考古探险来说 无疑是最理想的“宝地”。

居延地下埋有宝藏 史书早有披露。唐代牛僧孺《玄怪录》记述，北周时蠕蠕部主勃都骨抵率部众屯居延，每夜地中有喧嚣哭泣 发卒掘败屋残垣 得粮秣、衣囊、兵刃、木简 云乃汉将军李陵部属 与匈奴单于激战兵败处。又黑城遗址（哈喇浩特）蒙族民间流传，成吉思汗西征围攻此城池，城内弹尽粮绝，守将黑将军将无数珍宝投沉城内一古井，然后壮烈牺牲。

关于居延考古，先要提及最初西方人在我国西北的所谓“探险”，特别是英国的斯坦因。他在窃去敦煌千佛洞大批文书、绘画之后，于 1906—1915 年又连续在新疆、甘肃盗挖了不少汉晋时期遗址 获千余枚文字木简<sup>③</sup>。这是近代中国竹木简牍文书的首次出土。其中包含在敦煌汉代玉门关一带烽燧上出土的 700 多枚，全数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。由此而更加诱发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大肆盗窃文物之风。我国学者王国维、罗振玉、张凤等，及时地研究了这批珍贵史料，<sup>④</sup>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简牍研究之先河。其后，20 年代末，德国出资欲对中国内蒙、新疆进行全面的综合调查 经中国学界力争 合组了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由瑞典斯文·赫定、中国徐旭生负责 从北京、包头进入居延<sup>⑤</sup>。1927~1928 年 中国学者黄文弼等由北部沿河向南至甘肃金塔、鼎新，首先发现居延诸遗址。1930~1931 年，团员瑞典人贝格曼接着对 200 余城障烽

燧等遗址进行逐一调查、编号 对其中的 29 个地点进行试掘和采集，一举掘获木简 14000 余枚 总称之为“居延汉简”<sup>⑦</sup> 另有大量其它文物。按协议 实物由贝氏携回瑞典整理 据闻 1955 年中、瑞建交时，瑞典政府将其交返中国历史博物馆。简牍运回北平，由北大、中研院的马衡、刘复、傅振伦、贺昌群、劳干、陈槃、余逊诸人整理考释。后数年即将完成出版，适逢“七七事变”，简牍随人员南迁 辗转天津、上海、香港等地 连年战火 书版焚毁 简牍则转去台湾。50 年代海峡局势紧张，又一度去美国保存，现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。

居延汉简之重要 首先在于简是纸张、印刷发明之前的书籍文档。我国文字、文化的记录、传播载体，自殷商到魏晋共 2000 余年 主要靠在竹木制成的简册上写作 可称为“简牍时代”。而其它甲骨、钟鼎、碑碣、丝帛上的书刻文字形式 均非主流。竹木简册易朽难存 历史上虽有发现，<sup>⑧</sup>但早已湮没不存 又绝无传世书 连学者也很难想象出当时的书籍文档是什么样子！简牍出土后，人们才明白所谓“笔则笔之 削则削之”、“韦编三绝”、“学富五车”、“杀青”和“断章错简”的所指<sup>⑨</sup>。其次 居延汉简为汉时政府、民间的行政、管理文书、簿籍原件，乃是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原始档案文献库。其数量之巨 样式种数之多 内容之丰富、新颖、可靠 补证史籍并能解决历史疑难之重大价值，均属罕见，故即刻成为学界关注之焦点。劳干 1944 年于重庆刊印《居延汉简释文》，学人趋之若鹜 著述甚众 成就显著 空气十分活跃 形成简牍学研究之第二次浪潮 至 60 年代经久不衰。受其影响，1944 年向达、夏鼐等人赴西北 于敦煌再次发现汉简。<sup>⑩</sup>建国前后 日本急起直追 森鹿三等数十位学者成立简牍研读班，专攻居延简，颇具势力。我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的简牍研究也是方兴未艾，但因政治原因而资料、人员分散 甚受影响<sup>⑪</sup>。英、美、瑞典等国的研究活动也比较活跃。总之，这一时期的研究已走向世界，力量以中、日为主，发布刊印了大量

原始资料图版，基础工作与学术研究并重，组织上由个体向群体发展，方法上趋向多样化。其间虽有信阳、长沙等楚简和武威《仪礼》等简的发现，一度研讨热烈，但在简牍学领域，居延简始终占据着大宗主导地位。

70年代，中国简牍研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，掀起又一高潮。肇始其端的有两个标志，一是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《孙臆兵法》竹简，一是在居延的新一轮考古发掘调查。后者任务落在甘肃省博物馆肩上。

事出有因。1969年中、苏珍宝岛事件引发了“边疆考古”同年底额济纳旗划属甘肃，则提供了一个契机。我所在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，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中、蒙边界的居延。联系30年代的活动，那显然是一个令人兴奋、向往的目标。1972年秋，酒泉地区文化局贯彻全省文物会议精神，专门组织一次对额旗的文物调查。闻讯后，省文化局文物处王勤台（女）、省博吴怡如、赵之祥等即参与同行，车、步结合，取捷径进入这段无人区，踏察了大湾（贝格曼编号A35，下同）地湾（A33）、金关（A32）、察科尔帖（A27）、布肯托戾（A22）、破城子（A8）等重要遗址。仅地面采获汉简即近800枚<sup>⑩</sup>，情况令人鼓舞。所以很快便确定了1973年正式发掘的计划。

应当承认，居延考古是个高难度的大课题。除了形势背景有利外，我们的基本条件和准备还很不充分。以我而言，对居延考古知识，只记得在校学习时，业师张维华讲述河西四郡的设立，证引居延、敦煌简，言之凿凿，颇有启迪，仅此而已。恰好我当时正整理武威磨咀子汉墓第四次发掘报告<sup>⑪</sup>，其中有占卜葬仪木简，逼着自己查阅陈梦家的《武威汉简》，进而接触敦煌、居延简。也幸好馆藏书刊颇丰富，但凡国内出版的资料和著作，逐一研读，潜心准备约大半年。这次学习对我的考古生涯是一个转折，前贤诸家的成就、风范有榜样、引路之功，使自己以后少走许多弯路，不致失误和无所

作为，受益匪浅。像王国维的渊博学识、精辟辨析，劳干的深究穷竟、锲而不舍精神 陈梦家总揽全局、精密构筑的思考等 令人至今钦佩感念。1960年夏 陈氏受遣来馆整理武威简，名曰帮助 实为主持主笔。陈乃著名学者，深居简出，谦和寡言，没有架子。何乐夫先生时为甘博副馆长，曾参与研究。郭德勇为发掘者之一，协助陈整理 后又参加居延发掘、简牍编缀 非常扎实熟练 与这段熏陶有很大关系。此为馆内最初从事简牍考古的两位。陈氏于完成《武威汉简》书稿的同时<sup>④</sup> 视野转向汉简。1961~1966年间 持续对居延等西北所出汉简以史学、文献、考古学结合的角度，重予全面审度与整合排比研究<sup>⑤</sup> 陈公柔、徐华芳参与其事<sup>⑥</sup>。陈氏有条件利用田野原始材料。这一尝试至为关键，也是此前汉简研究的最大难题、缺陷。其结论未必全部确当，但无疑为此后居延考古提供了思路和参数。可惜的是他的工作刚开了一个头，这或许只是其计划中的一部分，便过早地逝世了。

从1973年开始，居延的田野考古全面展开，主要有以下活动：

1. 1973年7月—9月肩水金关发掘；
2. 1973年10—11月、1974年7—9月破城子即甲渠候官的发掘；
3. 1974年10—11月甲渠第四隧发掘；
4. 1976年8—10月居延北部地区调查；
5. 1980年9—10月居延南部地区调查；
6. 1982年8—9月甲渠候官、第四隧补充调查；
7. 1986年9—10月地湾即肩水候官发掘。我根据记录、记忆，将这几次重要活动的情况，概略介绍于兹。

#### 肩水金关发掘（1973.7—9）

当年3~4月 王勤台、岳邦湖先期赴居延联系 踏察、确定发掘金关、破城子、保都格烽隧（P1）三地点。国家文物局拨款并分配越野吉普车一辆 驻军、酒泉地区保证给予人力、生活支援。

7月初，各路人员汇集酒泉，包括王勤台、省博岳邦湖、赵之祥、任步云、初世宾 6 人，地区文化局、敦煌、安西、玉门、酒泉、金塔、额济纳旗等县市 8 人，合组居延考古队。作短期培训后，7月 11 日出发，取道金塔、鼎新（毛目）天仓，由此以北进入沙漠戈壁无人区约 25 公里至地湾以南驻营，发掘目标金关和地湾障城在此处以北 3 公里，遥望隐约可辨。

金关为一汉代关隘遗址，坐落额河东岸边，地形似壶口，向北地势平阔，向南两翼山峦起伏，各设一道烽隧、塞墙防线，联结于关址所在，中间拱卫着张掖郡肩水都尉府、肩水候官即大湾、地湾城障等屯戍重地<sup>①</sup>，是进出河西腹地、北通居延的第一道咽喉门户。汉代张掖郡辖属的居延、肩水二都尉，分守额河北、南二区。下属共 10 个候官（塞）士卒约 3000 人左右<sup>②</sup>。“肩水”或指肩负河川之意，其位置恰当额河与其上源北大河、黑河之交，后二水会合处为今甘肃金塔之鼎新，乃汉代酒泉郡会水县治。“金关”则有“固若金汤”之义。此次选点，主要考虑到汉代关址从未作过发掘，其次，为交通必经之地，肯定会遗存综合全面的重要资料。1930 年，贝格曼于此掘 5 个“坑位”，获简 850 余枚。其痕迹俱在，形状、深度均不一，显然是草率随意所为。

工作从 7 月 13 日开始，9 月 25 日结束，严格按田野考古发掘程式进行，共发掘探方 37 个，总面积 1300 平米。揭露清理出关城阙门、障堡、烽火台、坞院各一座，屋舍 20 余间，及虎落藩篱、鹿砦、木刺、烽竿、烟灶、转射、犬笼等军事设施遗迹，获得木简 11577 枚，其它各类文物 1311 件之多。

发掘期间，因距离较近曾多次采访地湾、大湾遗址，采集木简 96 枚。此二地点非常重要，贝格曼 1930 年夏天于此采获木简分别为 2383 和 1334 枚。大湾城规模巨大，内外两重，汉代以后被使用修葺过，四周全被沙丘丛林湮埋，极难进入。其西墙临河，一角已随岸崩塌毁。地湾，闻 60 年代末有大批简牍出土，惜毁佚无存。

因此，发掘才选择了规模小、工作容易的金关。

另外，8月中旬一次涉河水往西岸调查与金关隔河相对的烽隧(T169)，隧北侧有焚烧积薪之迹4处，各距10数米。又一次，是踏察金关向北的第一座烽隧(T168)距离2公里，砂碛覆盖下的轮廓清晰可辨。堆积层厚1米，稍作试探，即获木简300枚，掩埋之，留待正式发掘。此地为简文所言之莫当隧，属于橐他塞(候官)为其南部治所<sup>①</sup>。

金关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异常恶劣，其地属典型沙丘荒漠，干旱少雨，寸草不生<sup>②</sup>。夏季酷热，气温总在40℃以上，地表超过60℃。又多大风沙暴，动辄天昏地暗、飞砂走石。我们采取早6—10时、午4—8时工作，避开炎热日晒，或用柴油发电挑灯夜战。驻军捐赠一帐篷，在日晒酷热难熬时，藉其一片阴凉稍作休整。不论是掘土、清理，还是测绘、记录、摄影，整天与风沙尘埃为伴。古烽隧长期积累的燃烧灰烬，稍动土即弥漫飞扬，发掘者风镜、口罩、靴帽全身包扎严密，像“防化兵”一样。记得8月初国家文物局刘仰峤书记来金关视察、慰问，是日风速八级以上，人们站立不稳，只得弯腰或匍匐卧地，工作全停。所以，现场必须随时清理并结束，否则一场风暴，吹得荡然无存，或被掩埋，搞得面目皆非，前功尽弃！重新清扫、返工是经常的。

金关的日子也是整个居延考古中生活最艰苦的一段。水，是从近200公里处运来的，有一次断水三日，只许饮用，不得洗漱。体力消耗极速，急剧大量的出汗需及时补钙，营养也不充分。然而大家依然情绪饱满、干劲十足。因为天天都有新的收获发现，惊奇和喜悦总是冲淡或抹去疲劳。当茶余饭后在烛光下加班整理资料，思索一件件文物中隐藏历史秘密时，心境如水，万念俱寂，得到很大的满足。快离开金关了，干涸的额济纳河从上游缓缓淌下水流，宽阔的河床立刻充满勃勃生机。考古队员们逐水流而雀跃欢腾，思绪飞向遥远的第二个发掘点破城子……

破城子发掘 1973.10~11,1974.7~9)

1973年9月28日,居延考古队束装北上,沿额济纳河经过察科尔帖、大青山、新西庙、红旗牧场抵破城子,又走了25公里,夜抵额旗政府所在达赖库布镇(T3~T5)行程200余公里。沿途无正式道路,时而戈壁沙丘,时而沼泽丛林,渺无人烟,中间数度迷路,仅河边洼地处散落二三孤零零的畜圈牧舍。

破城子,蒙语名“姆·都尔贝金”,位于达赖库布镇南、额济纳河东河的支流伊肯、纳林二河间的戈壁滩高处。其地为居延都尉所辖的两道塞防中最强的西部即甲渠塞(候官)的首府,是一座坚固的障城,其南北一线,至今仍保存一串共30多个排列整齐的烽隧;在纳林河东岸,还有一串归它管辖的烽隧,共同卫护着再向东的居延都尉府、居延县的屯田、居民区。

1930年12月—1931年1月,贝格曼等在该地试掘4个点,获汉简5216枚,是他收获最多的一处。然而和金关一样,实际上是到处试探之后,哪里丰富便挖哪里,无科学性可言。幸亏他对这所居延地区最重要遗址的“试掘”只是小面积的,尽管有些部位也扰动严重,对我们的发掘还未形成致命影响。

破城子的发掘分两期进行:

第一期,9月的最后几天,我们作了充分休整,同时认真总结了金关的工作。发掘从10月8日开始至11月14日,每天赴破城子工地一次。现场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,中午野炊并作短暂休息。此期开方14个,即坞壁内东北角的T1—9,鄯城内部T61障南墙外侧T48、49、61、65、68的一部分。T2、3、5、6系贝氏挖过的第Ⅲ地点,地表已扰乱,下部的遗迹也部分受到试掘的破坏。T48、49,贝氏第Ⅳ地点,他实际上扰动的面积要比报告中图示的大。该点遗存东汉和魏晋时期使用、修葺障城的痕迹,可惜也被搞乱了。障城未被扰动,只在内部的积土顶部有几个小掘坑,但报告的测图未标明。积土共清理980余方,堆积分四层,第一层为障内地面、屋舍

等；第二层是被焚毁的倒塌堆积，据同出木简，时间约在王莽地皇三年；第三层为毁弃后的堆积，此层顶部发现燃烧灰烬及北方草原文化系的单耳红陶罐等，表明障城废弃以后又再度启用，并被少数民族匈奴占据活动过。结合其它资料大致可推断在东汉章和帝时期；第四层为此后直至近代的堆积。

人员的变化 玉门、敦煌等地的队员陆续撤出 解放军共派 25 名干部战士参加。后增加了一部苏式嘎斯卡车，以供交通、拉水并经常赴酒泉采办蔬菜食品等，比金关时期大为改善。

安排夏、冬两季分别发掘金关、破城子，是选择刮风最小的季节。可是，居延地区的地貌，使它最易受新疆、西伯利亚气流的侵袭。居延北部的风砂，绝不比南部金关逊色<sup>④</sup>。不同的是我们又进入一个天寒地冻的世界。刚过 10 月不久就飘洒起雪花早晚极冷。到 11 月气温已降至  $-20^{\circ}\text{C}$ ，据说最冷可达  $-40^{\circ}\text{C} \sim -45^{\circ}\text{C}$  野外已无法工作 遂于 11 月 15 日暂告结束返回酒泉。

居延发掘中有几个疑难一直困扰我们。一是居延都尉府的位置，发掘证明过去以破城子为都尉府的推论不确，它实际上是都尉属下的甲渠候官。为此，考古队趁业余休息时，曾多次踏访索果诺尔、宗间阿玛、红城子（乌兰都尔贝金，F84）、居延城（K710）、黑城子（K799 哈喇浩特）等古城址，但均无确凿证据。二是“甲渠”究竟指什么？！据当地群众反映，在甲渠烽隧线南端的 T21 和河东 T108 处，伊肯河东岸有一“渠口”修筑整齐，宽 16 米，渠道向东北黑城子方向延伸，后变窄为 16 米。贝格曼在黑城附近亦发现渠道田舍。我们曾专程去该处调查过，地貌极复杂，亦无所获。联系简文和实地勘察，可以断定在甲渠塞以东的大片屯戍区，必须有水利灌溉系统，“甲渠”可能是指“第一渠”即主干渠道，甲渠塞或因位于此源渠口而得名？但西夏、元代在居延也有屯戍活动，群众所指遗迹不一定是汉代的。三是简文屡屡提到汉居延县境有所谓“索关”，与“金关”齐名。我们估计其地在甲渠塞南端与卅井塞 T110、T111

的连接处，但实地访查也无结果。

1973年发掘归来，在兰州曾举办一小型展览，向领导汇报，影响甚轰动。那时我正患肺病<sup>②</sup>，因在金关劳作过度，至破城子已体力不支，后转为室内整理，回兰再忙累一番，雪上加霜，一蹶不起。故次年未能再赴野外，调郭德勇顶替。

第二期，1974年6月23日，郭德勇先赴额济纳旗，筹办将队部、驻地迁移破城子南保都格地方的河边一废弃水文站，全队集中于此。省博人员如旧，地区文教局、酒泉、额旗各参加1人。7月26日发掘，历时60天，于9月24日结束。

此次掘采方 T10—44，即坞内东、西、南壁及屋舍、堆积；又坞南50米一小烽台（T60）和坞东30米处的灰堆（T50—59）。烽台较小，不在烽隧线上，可能是候官的专职哨所，负责警戒、联络和发布消息。贝格曼见该处为一土丘，曾于顶部试掘过，认为无建筑遗迹。坞东灰堆乃长期倾倒废物而成，范围70×40米，深处厚1米。此处贝格曼扰动最严重<sup>③</sup>，地面到处有掘坑。我们划分10个类似采沟的大方，将其全部清理，所出简牍年代均较早，数量多，占全部简牍的1/2，而文物尤为丰富，达740件。

总计以上两期发掘，原计划布方68个，实掘采方60个，面积3000平方米，揭露出一座典型的边塞县级军事建筑——候官的原貌，包括其障城、坞院、烽台及坞门（回门）、马道、阶梯、候楼、非常屋、鹿砦、垒石、转射、堵门土壑等军事设施。障、坞内部，发掘清理出各类房舍37间，据出土物等迹象，判定用途分别有官吏居室、士卒住房、危急时隐蔽用房、文书档案室、仓廩、库储、门哨、圈棚、厕楼等。郭门之前，有一独立土坯墩，可能是“吊桥”遗迹，但属东汉前期所为。

破城子发掘共获木简牍7865枚，其它各类文物881件。如加上贝格曼所获，为居延考古收获最巨之地。该地点并未全部发掘，在坞东灰堆的以北以东，仍有堆积层未动土。又障城外侧西、北、

南三面因土方量大亦未清理。坞壁四周发掘也仅限于3~4米以内范围。这以后，闻有过路者亦前往访古寻宝，故需继续组织清理发掘。

#### 甲渠第四隧的发掘(1974.10—11)

在驻地西侧蒙名“保都格”在破城子南5.3公里的伊肯河西岸高处与破城之间相隔3座烽隧，极目可辨。该烽隧较大，方8米。据简文为甲渠候官(塞)的“第四部候长治所”本名“第四隧”。甲渠塞沿伊肯河两岸的塞防共约80余隧，分属于10个部。其首长塞曰候、尉部曰候长，管辖6、7个隧不等，隧曰隧长。候长所驻隧一般较大，人员多，连隧长，每隧约5—6人，部名依所在隧名而定，故称“第四部”。此隧地近候官，乃其近要，据简文，东汉初这一带匈奴大肆进攻破坏，战争激烈，不久即废。

贝格曼1930年到达此地，未进行试掘，仅于地面采集木简1枚。

发掘分两个区，9月25日开始，11月5日结束。西区烽台残高4米，与一小堡连筑，东侧为坞，清出屋舍、畜圈5间及烟灶、鹿砦、转射、回门等设施。东区为灰层，21×16米，开探方T1、2。总共出土木简195枚，各类实物105件。

#### 居延北部地区考古调查(1976.8—10)

金关等三地小试即获重大成果，取得宝贵经验，其地下蕴藏之丰富勿庸置疑，遂产生长期大规模工作之动议。然而，就当时所积累的资料、认识，难以对全貌和总体作出清晰准确的判断，以指导制订工作计划。特别是北部，即布肯托尼以北地区，以古居延为中心的广袤地带，荒凉、陌生、神秘、扑朔迷离，使我们不得要领。那里究竟有多少遗迹？沙丘吞噬了哪些城障、烽台、田渠、屋舍？最关键的居延都尉府、居延县到底隐藏何处，其文书档案库还埋在地下吗！？出于种种考虑，决定休息一年，然后首先对布肯托尼以北地区作全面调查。

1976年8—10月，省博岳邦湖、任步云、马建华及地区文教局、额旗共5人，聘当地蒙族向导，拉驼队携带行装、饮水、食物、工具等，轻装徒步出发。因装备、手段甚简陋，仅只罗盘和稍精密之地图，比贝格曼当年水平可能还差，故勘察地点路线未超出贝氏的范围。共踏察遗址87处（其中汉代的82处），另查得汉以前少数民族文化遗存1处<sup>④</sup>，而贝氏已编号的遗址10数处遍寻未得。至于从未问津之处，肯定还有，只有留待将来了。

此次调查的最大收获有三。一是证实了贝氏的调查结果，而时代上有小部分作了订正，并新增1座烽隧为前所不知。二是据考古迹象，断定过去认为是居延城（k710）的时代较晚，不可能是居延都尉府，而蒙名班登博勒格的k688城可能性较大，但这只是印象，还需发掘证实。三是对居延都尉所属的殄北、居延、甲渠、卅井等四塞各自的戍卫范围，及其相互衔接关系，即居延全区的布防形胜，较过去认识更深入。四是获木简193枚，实物30件。其中在卅井塞的T130烽隧采集木简156枚。据简文，名称“次东隧”，位当该塞与居延腹地的联络线上，对探索建置和考定所属，具有重要价值。

#### 居延南部地区考古调查（1980.9—10）<sup>⑤</sup>

1979年，省博岳邦湖、吴初骧、李永良等另组织敦煌考古组，当年发掘马圈湾烽隧后，次年秋，增加徐乐尧、马建华从酒泉沿北大河、额济纳河进至布肯托尼，沿途重作调查。此段属于肩水都尉范围，由北而南分布广地、橐他、肩水诸塞（候官），返程从鼎新进入黑河（甘州河）踏察了正义峡、天罗等地沿河烽隧，均在甘肃高台县西北。于后一地点获“军司马”铜官印1枚，白文。篆法浑润凝重，风格似东汉建武初年，我怀疑它是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驻节张掖时，其军营部曲所遗。张掖郡治觿得县在此地东南不远。

#### 甲渠候官、第四隧补充调查（1982.8—9）

此次为补充过去工作中记录、摄影、测绘之不足，和解决一些

悬疑，岳邦湖、任步云、赵之祥、何双全和我再赴居延。该地 1979 年又划回内蒙古管辖，工作得到内蒙古文化厅、额旗文教局、文化馆的有力支持，完成预定目标。另外，对建筑的结构、构筑细部作了探索、解剖 例如障门 前次未清理 此次得知门洞方形 两壁上下设枕木以排叉方柱支撑 然后铺列过梁、地袱等方木 木门两扇，门臼等仍存。在障城以西 300 米的所谓“双道塞墙”上 选一段试掘并解剖 发现内墙为塞墙 较宽 与外墙之间低洼 满蓄细沙 而外墙窄小。由此可断定 此即汉简屡言之“天田” 在塞墙外侧 用沙地印留人畜足迹的办法，检测偷越塞防的情况。汉边塞守御设施的“天田” 唐代称“土河” 后来制度湮灭 人多不知究竟 此发现可谓增一铁证。此次共获木简 22 枚，最重的是一枚西晋太康八年纪年简 出障东南角外侧墙皮中 证明晋初仍使用、修葺过。另外，坞东灰堆获“凉造新泉”铜币 1 枚。在第四隧采集芨芨编的草绳一段 疑是简文所谓“兹其索” 可藉以攀登烽台顶。

#### 肩水候官的发掘 (1986.9—10)<sup>④</sup>

其地俗称地湾城 在肩水金关南 1 公里。发掘前，方形障城暴露于地面，规模与甲渠候官全同，周围有套叠的两道坞壁，西侧地势渐低，近河处已被冲毁。如前文所述，额河南半段的肩水都尉区 设肩水候官(塞) 此点与北部居延都尉设居延候官 完全对应，同出一辙。据简文和现状，肩水塞不仅管辖金关，而且设两道塞防 夹河峙立 其所属部隧 名称有左前、左后、右前、右后和东部、西部等 类似军营的安排。

1930 年贝格曼在此处试掘 18 个坑位 坑位相当杂乱 出木简 2383 枚，仅次于破城子。1980 年的调查，发现仍有埋藏，曾计划适当时发掘。1984 年，省博物馆的文物队在业务上独立，1986 年 5 月正式分家为考古所 而我 1985 年调省博工作。省级博物馆按现时体制一般不做田野考古，任务又不相属，故从此逐渐脱离居延考古。这次发掘于 1986 年 10 月 由岳邦湖、任步云、吴初骧、马建华

等参加 闻出土汉简 1000 余枚 其余详情不明。

居延考古的田野工作 大致如上述 至 1986 年告一段落。但受其推动、影响，甘肃和西北地区的简牍考古有如燎原之势，重要发现 层出不穷。如 70 年代末，中国考古研究所在居延破城子以北的发掘，80 年代初新疆考古所在楼兰等地的收获。甘肃方面尤为突出<sup>④</sup>，先是玉门出土汉简（1977）；接着 1979 年敦煌西部马圈湾烽燧（D21）出土汉简 1221 枚 又 1981 年武威磨咀子汉墓出《王杖诏书令》；1986 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出《日书》竹简 470 枚 木版地图 7 枚 而后 1990—1992 年 省考古所连续三年发掘敦煌汉“悬泉置”遗址 累计得木简 2.3 万枚<sup>⑤</sup>，宣告敦煌汉简继居延汉简而步入高峰时期。

居延考古的室内整理工作 以简牍为中心 到 1990 年释文《居延新简》出版 历时 15 年。其实，释文工作早在金关时已开始。1974 年经酝酿已初步形成有关简牍整理的程序、规范等意见。1975 年由我负责组建“汉简整研室” 调集郭德勇、任步云、肖亢达、乔今同、何自谦、李玢（女）和酒泉冯明义、安西刘仲武、敦煌韩跃成、额旗苗天润等参加。共费两年 先甲渠而后金关 将 2 万多枚简牍的全部资料做成档案。其工作程序：一曰清理，包括清剔泥沙污染使字迹显露，及粘接复原和正型等。二曰记录，按方位、层位、单元、次序，将每枚简牍的详情编号后逐项登册，内容有原始号、木质、尺寸、形制（如简、觚、检、牍、两行等）简图、文字、时代（含纪年）保存现状、备注等诸项及释文、校审者与时间。其中的图、文两项为一栏，依照简的现状作草图，将简文初释于图上并加注释文符号。三曰拼缀编次。此项可穿插与前二项同时进行，也可以单独做。依照文书的名称、格式、性质、用途、文牍用语、行文程序等 将简牍分类 再据其内容以及形状尺寸、位置（上、中、下段 左半、右半等）破损（断碴及新旧等）木质（纹理、色泽）字迹（书法等）特别是文字语言和意义是否通顺一致等要素 将分散、

残断的，逐渐缀连拼接一起。拼缀范围视发掘出土情况而定。有的简册，一枚简断成数十截，可得以复原。这与发掘质量水平有直接关系。如果出土时即分散打乱，是很难恢复原样的。编次是据册式、内容与其它迹象，编排简的次序先后，除内容的连接、通顺外，像编绳、虫蛀等迹象也可利用为证据。四曰反复校释写成文本。

以上是原始档案和初释、初校。1978年决定与古文献研究室、社科院历史所合作，先进行甲渠候官、第四隧。任步云、何双全携档案赴京，同于豪亮、李均明、谢桂华、孙言诚、连劭名等据照片并参照档案修订释文，直至1982年形成修订稿。与此同时，初世宾、张邦彦等在兰州亦校释初释文本达3次。1983年—1984年，北京组来兰共同对照原简校释一次，又全体集中北京再校释、讨论一次。同年秋，张政烺、裘锡圭、李学勤、徐华芳诸家参加终审，决断疑难<sup>②</sup>。从此定稿，再未大动，前后凡重要校释共八易其稿，总的说来是居延汉简释文水平最高的一次。至1994年底，中华书局将图版、释文出版《居延新简——甲渠候官》破城子、第四隧所出简牍的整理才算完成，但距发掘已整整过去了20年了。

十分遗憾的是，此二地点的其它整理工作与报告编写，自1982年始，仅较顺利地做了3年。其中方位层次的分析，建筑的结构、用途、断代，出土物的考定，简牍的拼缀辑合与断代，重要简册的考释，总论与专题的研究，以及附录资料和摄影、绘图等都分别做了大量工作，已积累近20万字。但由于1985—1986年的机构人事变动，不得不搁置下来<sup>③</sup>，拖延至今仍未完稿。而曾参加其工作者，陆续退休或病故。对此，学界的期盼、呼声甚高，如不及早补救并完成，将成为学术史的一大损失，终生为憾！

居延的新考古收获，是我国在二十世纪史学、文献学、考古学、军事史学领域内新增的一笔重大财富，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价值。

候官、部隧、关隘等三种不同级别形制军事建筑的清理发掘，

在居延乃至中国考古史上均为首次。弄清其规模布局、构筑方法与性能，发现一大批久已失传的军事设施器备，恢复其历史真实面貌。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建筑学、军事学的内容。

特别是新居延汉简的发现 在数量、史料价值、科学性上 均属前所未有的。这 2 万多枚木简，包括了简牍书籍文档的各种形制如札、两行、牍、册、觚、符、检、柿等 反映出选材、尺度、修治、编联、书写、削改、检题、校勘乃至标点、字体等一系列治簿成书的制度 容纳了诏制、律令、品条、奏记、案举、劾状、课算、簿籍、卷牒、檄封、符传等文书形式，其中都有不少为首次问世。最突出的是，由于是科学彻底的发掘，得以保持册形和方便缀合，故完整簿册或接近完整者尤多。仅粗略整理 甲、金二地即有 70 多个成形簿册。何双全曾试作甲渠候官所出新、旧简的合缀 可成 300 余册。比之双字断简，完整簿册的可靠与价值是勿庸赘言的。更何况，这些簿册出之于档案室，一部分簿册系一事而编档存案，这就更加珍稀了。简册内容 上至中央的诏制律令 重大事件、决策，下至各级政府、军队政务管理、屯戍活动的各类文书 新资料很多 过去已作介绍<sup>⑥</sup> 此不一一列举。但我要强调，居延简不同于墓葬出土的文献简牍，它是历史实录，其内容博大深广而又融汇连贯。它所提供的史料，不是单一和孤立的，而是综合性相互联系的。每一史实，皆有背景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活动……“材料很‘活’”。大到典章制度 小到生活细节 非常丰富 可以说是“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”。在这一点上 新居延简的价值也是超过旧简的。

居延考古的新成果 70 年代末陆续发表，学术界就一些重要简册讨论热烈，见解深入。省博简牍整研组成员，结合释文工作，就一些簿册和某个专题，作了点研究，有的单独发表，其中一部汇为《汉简研究文集》于 1984 年底出版，引起一定反响，代表那时的研究水平。后又汇编出版了《秦汉简牍论文集》（1989 年）。为配合简装本释文的出版 也是应海内外要求 古文献室、社科院历史所、

省考古所和我馆联合筹办了 1991 年兰州“中国简牍国际学术研讨会”。我忝为会议秘书长，很是忙碌一阵。会间馆、所两家还联办《甘肃汉代屯戍遗址和出土简牍》专门展览。这是中国简牍研究的首次国际性会议，到会学者 100 多位，大陆、台湾共 65 人，日本等国 35 人。何兹全、裘锡圭、安作璋、马先醒、大庭修、永田英正等出席，收到论文 85 篇，盛况空前。台湾马先醒先生率同事 12 人赴会。同是研究居延汉简，却从未谋面，真是相见恨晚！又会议普遍倡议在兰州成立简牍学国际研究会，令人感动。又次年，日本大庭修先生于大阪又筹划了一次简牍国际会议，邀请中国学者 10 人，我有幸得列其中。与会学者达 250 人之多，可见日本学者对简牍研究的重视程度。整个 90 年代的简牍研究十分活跃，新资料层出不穷，近来又有长沙吴简数十万枚的惊人发现。比较之下，居延汉简的工作，大陆显得沉寂些，而台湾、香港成就、活动较多。甘肃方面，因敦煌汉简新发现，人力、重点有转移调整。总的说，缺乏重要动力和重大突破。不过也正在积极地在思考、准备，前景还是乐观的<sup>④</sup>。

回顾过往，面对将来，有些不成熟的想法。像居延或敦煌这类古代遗址并出土大量简牍，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干旱地区，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，地面上下的蕴藏量极大，价值极高，是历史文化遗产中最堪珍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。居延、敦煌考古与简牍研究，与本世纪同龄，对中国史学、考古学作出重大贡献，是简牍学文献的奠基开拓者，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、传统。因此，有关方面和地方应将其列为重点工作，制定长期、全面的工作规划，给予组织、人力、经费的保证和照顾，像甘肃省就有必要建立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，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不间断地持续下去。主要任务，是不断发现并保护遗址、遗物，及时向社会公布简牍及其它资料，提供研究。自身也要利用群体和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优势，有组织地进行研究。要加强人才培养，解决好青黄不接的断层问题。要积极开展学术